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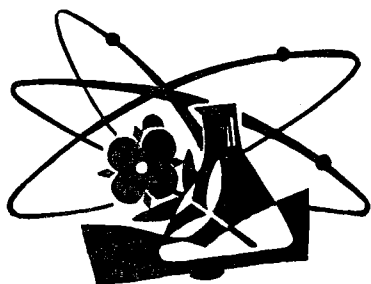


攀登之歌

· 报告文学 ·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學家教

• 報告文學 •

攀 登 之 歌

• 报 告 文 学 •

*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5 1/4印张 3 插页 104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统一书号: 10173·151 定价: 0.40元

目 录

辛勤传马列 桃李正芬芳·····	余 纲 王增炳 (1)
磊落·····	叶永烈 (27)
为了科学的春天·····	张元锦 (58)
道路·····	王晓萌 (71)
踏遍青山人未老·····	叶永烈 (84)
满目青山夕照明·····	陈 慎 (91)
驾舟的人·····	陈 宴 费介云 (106)
征途·····	朱 红 (121)
万绿丛中万里行·····	陈佐洱 (143)
鹿工曲·····	肖 肖 (156)

辛勤传马列 桃李正芬芳

——纪念王亚南同志逝世十周年

余 纲 王增炳

辛勤译著传马列，业绩长垂海内；

不倦教诲育桃李，深情常在鹭滨。

这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福州举行的王亚南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王亚南生前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厦门大学的师生员工敬献的挽联，它概括了王亚南同志光辉的一生。

王亚南同志的一生，是努力钻研，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一生，是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

一 “野 马”

生活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尤其是在苦难的年代。

一九二四年，二十三岁的王亚南离开家乡湖北黄冈，抱着“教育救国”的幻想，到武汉中华大学念教育系。为了生活，他每天得来回跑几十里路到近郊的楚材中学兼任英语课，后来又武昌成城中学兼任英语教员。白天听课，教课，疲于奔命，剩下的时间不多，只得起早摸黑，拼命念书，抄

书。因为没有钱买书，见到心爱的书就借来抄，连《史记》这样大部头的书也抄。他兴趣很广，曾经先后以中文系、英语系为辅系，涉猎群书，古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历史、文艺……各方面的都看，没有一个中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海阔天空”。然而，广泛阅读之中，他毕竟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同时，由于在中学兼课，一九二六年底，认识了当时新成立的中小学教师党政训练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他接受了进步的影响，逐渐怀疑过去“教育救国”的想法，而对蓬勃开展的第一次国内革命产生了向往之情。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只身奔赴长沙，参加了北伐军，被安排担任政治教员，教的是他自己根据三民主义改编的，后来自称之为“莫名其妙”的“政治经济概论”。

没过多久，大革命失败了。王亚南亲眼看到，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多少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流落到上海，不久又跑到杭州，在外西湖边上的大佛寺内暂且安下身来。这是一座破旧的寺庙，僧众零落，香火稀少。住持为了增加些收入，便把空出来的房间租给附近国立艺术院的一些学生以及象王亚南这样外地来的单身汉，还包他们的伙食。王亚南租了东边厢房的一个小间，每月租金才一块多钱，伙食也只要四、五元。这里地方清静，王亚南准备住一段较长的时间，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糊口。正如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一样，王亚南写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的内容，主要是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写了一个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投身大革命的青年。小

说的主人公具有野马一样奔放不羁的性格，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小说开头写得还顺利，写了三、四十万字，写到大革命失败，王亚南疑惑了：祖国的前途何在？青年的前途何在？满腔的救国热忱，要往哪里倾吐？……写作中的难题，也是生活中的难题啊！

正在这个时候，刚从上海大厦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的郭大力也因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流寓到这一座寺庙中。他爱好经济学，这时正发愤攻读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同时，他立下宏愿并且已经着手翻译这部巨著。学习和工作深入下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学力不足，尤其是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缺乏认识。他抱着《资本论》，艰难地啃着，译着，但不时遇到复杂而艰深的问题，不得不停顿下来。

郭大力住的房间和王亚南的相隔不远，吃饭又在同一个地方，见面的次数多了，加上年龄、文化素养、境遇的相近，就很自然地攀谈了起来。尽管两人的性格不尽相同，王亚南豪爽耿直而健谈，郭大力却比较文静，沉默寡言，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勤勉好学的精神，朴实诚恳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同志志向，使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地就成了推心置腹的知交。

他们渐渐地无所不谈，从个人经历到社会现实，从人生哲理到生活出路。他们觉得，一个人不应该虚度一生，总要给人类做出点贡献。他们痛恨当时社会的黑暗，为祖国的贫穷和落后感到痛心，他们热烈地探讨“救国之道”。他们还

交谈了各自的学习和工作，分享彼此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苦恼。这时候，郭大力极力鼓励王亚南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社会，从而找到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王亚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在郭大力的帮助下，他钻进去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钻研逐步占据了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成了他生活的主要乐趣，连他原有的业余文学爱好也退居其次了。钻着，钻着，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他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剖析纷纭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利器。在治学上，他也找到了归宿之点，它好象凸透镜的焦点，把过去所学的知识都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能量。他觉得，原先在写小说中所遇到的使他困惑的问题，现在都有可能找到答案了。不过，这时他已经没有继续写小说的兴致了。

当王亚南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郭大力又建议他一起来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这正符合王亚南的心意。为了使这个浩大的工程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他们拟订计划，首先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列入这计划的第一部名著是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接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等。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深入地学习和钻研。但是，学识的日益丰富并不能补救生活的日益贫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暂时分手。临别时，两人怀着共同的坚强信念：尽管流离颠沛，也要坚持完成原定的计划。郭大力返回上海，暂时在一所女校教书。王亚南得到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到了东京。

当时的东京，生活费比较省，又比较容易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王亚南开始靠译著来维持简朴清苦的生活，同时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狂热地涉猎各种进步的书刊，贪婪地吞噬各方面有用的知识。在那樱花烂漫，春光旖旎的假日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到风景区游览，他却拉了一个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好友，直奔书店林立的神田町，在旧书店里站着看书，渡过他的假日。离开旧书店的时候，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钱，他总要选购一些心爱的廉价旧书，满怀喜悦地抱回自己的寓所。在东京的两三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学术上也很快地成长起来。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久，应邀在暨南大学经济系任一点课，其他时间都投入紧张的写作和翻译活动。他跟郭大力合译的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出版，一时轰动了知识界。这是一部有名的难读难懂的著作，当年以谦虚见称的里嘉图把它拿去出版的时候竟表示：全英国是不会有二十五个人懂得的。郭、王译本出来，有人猜测译者一定是留过学的专家教授之流，后来知道竟是两个二三十岁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大吃一惊。一九三四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出版了。在这几年里，王亚南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和独力完成的译作《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绪论》、《欧洲经济史》等多种，在学

术界初露头角。

每一本译著出版的时候，王亚南总喜欢在序言的落款中写上“于野马轩”几个字。有一次，一位朋友问他：“‘野马’是什么意思？”王亚南笑着回答：“我这样东奔西跑，不是象‘野马’吗？‘野马’是不受人们羁绊的。”显然，这里的“人们”，指的是反动统治者。而对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王亚南是愿意为之驰驱的。他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他和当时的一些进步人士有了交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发动了著名的反蒋救国的“闽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很早就奔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后来还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闽变”失败后，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取道香港赴欧，到了德国。

一九三五年，王亚南离别欧洲，取道日本回国。当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的时候，两人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他们在经济学的专业和翻译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便决定正式开始共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资本论》在中国，一九三〇年才开始有陈启修译的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中译本出版；一九三二年，潘冬舟续译的第二分册（第二篇、第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王慎明、侯外庐译的第一卷前三篇分别出版。直到一九三六年，也才出版了王慎明、侯外庐译的第一卷全卷。这时候，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入广泛

的传播，广大革命者迫切希望阅读、钻研《资本论》的全译本。党组织了解了郭、王翻译的决心和计划，给以热情的支持和关怀。当时的上海，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恐怖气氛中，一般书店都不敢贸然接受译本的出版，而艾思奇、郑易里等在其中工作的比较进步的读书生活书店则明确表示愿意印行。另一家出版社得到消息后，以较优的稿酬向译者兜揽生意。郭大力和王亚南当时虽然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困难，但他们想，如果为了追求高稿酬而翻译，这和翻译《资本论》这件事情本身是多么地不相容啊！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地与读书生活书店签订了合同。

王亚南和郭大力分工合作，经历了几度辛劳的寒暑，多少个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多少次精细深入的探讨争论；为了一个译名的妥贴，共同反复推敲，为了一字一句表达的准确，一起再三斟酌。他们觉得，这是对革命尽自己的职责，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它。同时，对自己来说，这又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锻炼。在工作的进程中，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教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一九三八年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第一次从德文本翻译过来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终于胜利出版了。

二 从坪石到厦门

《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给王亚南带来了很高的声誉，成为知名的进步人士。但是，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在追

求真理、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他到了武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机构——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任委员。武汉失守前，他撤到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董必武同志，希望得到党的教导和帮助。董必武同志对他所努力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给以热情的肯定和充分的评价。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登门拜访，希望王亚南到中大教书。王亚南早已听说中大颇有一些进步力量，他想到那里也许能有所作为。早年“教育救国”的幻想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利用大学的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学生走向进步，未尝不可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出一点力。于是，他一口答应了许崇清的邀请。随后，偕同家眷到了当时搬到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就任法学院经济系主任。

王亚南到中山大学后，中共广东地下党把他作为进步运动的支持人，和他取得联系。王亚南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广大青年的期望，他巧妙地运用合法讲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课程，不但有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选修或旁听，甚至连一些校外青年也慕名而来听讲，听课者达数百人之多。有的学生为了生活而在韶关、甚至桂林、衡阳等地兼任工作的，每逢星期二、五上课时间，都坐火车赶来听课，听完课又赶回工作地点。而贩卖英美资产阶级一套的课程，有的后来只剩下两个人在听了。学生们拿王老师所讲的价值理论，同

当时流行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一对照，就发现后者所谓一碗水、两碗水、多碗水对满足一个渴者的价值愈来愈低之类的说法，简直是庸俗不堪，浅薄可笑。王老师的讲课象春风化雨，滋润了他们的心田。

在课外，进步师生喜欢到王亚南住的小土屋来促膝谈心。经常到这里的有一位社会学系的讲师、地下党员卓炯，他除了向王亚南请教《资本论》学习中的问题外，还曾经特地和王亚南谈到了延安整风。在伟大的整风运动的启示下，王亚南对自己结合教学正在进行的一项科研工作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无穷的力量。原来，他正学习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准备写出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这时，他更明确了：这不光是理论的钻研，更不仅是个人做学问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啊！于是，他更加勤奋地投入工作。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名著，王亚南的代表作之一——《中国经济原论》诞生了。此外，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等重要著作。

王亚南在中大进步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日益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和恼怒。伪教育部几次想解聘他，都因中大广大师生的反对而没有实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对派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加紧了。一九四四年夏天，王亚南不得不离开中山大学，应邀到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第二年秋天，他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到校担任法学

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得到了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一些进步的教授，如郭大力、洪深、林励儒、杨东莼、石兆棠、王守礼等人也相继应聘而来，其中很多是由于王亚南的推荐或邀请而来的。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民主、进步的势力，加强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当时，厦大的经济学讲坛上，仍然充斥着奥地利学派、马谢尔、凯恩斯一类的货色，贩卖着庸俗的反动的舶来品。王亚南来校后，为经济系开了好几门课，针锋相对地向那些抱残守缺、专断无知、崇洋媚外的学阀们挑战。他还利用课外的各种活动形式，如征文比赛、学术讨论等，引导学生联系实际，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由于王亚南和广大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结束了英美庸俗经济学在厦大讲坛的统治。

一九四七年五月，“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全国学联决定六月二日起全国学生总罢课。党领导下的厦大进步学生积极准备参加这一全国学运的洪流，决定五月二十九日起罢课五天，六月二日游行。为了破坏这次运动，厦门反动当局于六月一日凌晨三时派军警数百名，出动卡车突如其来地包围了厦大，逮捕了三名进步学生。清晨，消息传遍全校，群情激愤。大部分学生涌到校长公馆前面的小广场，要求学校向伪市政府要人。这时，伪训导长挤在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劝学生回去上课。学生们怒吼了：“不要理他！”伪训导长只好灰溜溜地退走。换了校长出来，还是那一套，劝学生回去。一连三次，都被学生轰了下去。这时，人群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一

小撮混在群众中的反动分子，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乘机大喊“打倒反动统治”的口号，企图煽动过激行动，制造血案。正在开始产生混乱的时候，王亚南出来了，激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王亚南站在石阶上，用响亮而坚定的声音宣告：坚决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要求。接着他建议学生派出六名代表，校务会议也派若干名代表，一起到伪市政府交涉，要求放人。学生们接受了这一建议，选出代表赴伪市政府谈判。伪市政府提出以取消“六二”游行为释放学生的条件。地下党为了避免损失，考虑游行改期，先把被捕的同学保释回校。当晚，为了召集学生大会，讨论游行问题，闽西南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和两位同学出来敲钟，被学校当局逮住，拘禁在厦大旅社，接着就被宣布开除学籍。于是，运动转为营救三同学的斗争。地下党连夜开会讨论营救办法。第二天，广大学生展开了反对无理开除三位同学的签名运动。王亚南义愤填膺，立即召开全系教师紧急会议。会上他斩钉截铁，表示“以自己的去留与三同学的去留相共”，进步教师当场纷纷响应，其他教师也表示要一致行动。于是，会议一结束，全系教师立即到东膳厅前，在一大片签名纸上，一一签下自己的名字，明确写上：若要开除三同学，即全体坚决辞职。在广大师生的压力下，学校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无条件地释放了被拘的三同学。

此后，学运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些运动中，王亚南无不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用各种方式对他们表示声援和支持。

一九四八年冬天一个阴冷的下午。和往常一样，王亚南十岁的儿子放学后，就转到信箱去看有没有他父亲的信件。这一次，他拿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特别重，有一头胀鼓鼓的，不知道包了什么玩意儿。一拿回家，他就嚷着：“爸爸！这封信好重，说不定哪位叔叔给我寄好玩的东西。”

父亲把信拆开，抽出信纸，咣啷一声，一粒东西滚到了桌子上。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而是赫然一颗手枪子弹。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共产党闹事，你幕后策划。你今后注意，如再此下去，我们就拿信封里面的东西来对付你！”

王亚南看了，轻蔑地把信一扔，骂了声：“卑鄙！无耻！”王师母李文泉听到了，从里房走出来，弄清了怎么回事，未免担忧起来。王亚南平静地说：“别理睬它，没什么了不起。”

斗争毕竟越来越尖锐了。一九四九年初，王亚南从台湾大学讲学回来，地下党组织派人通知他，特务已经准备对他下毒手了，香港党的负责人已通过杨东莼托人买好了船票，要王亚南尽速设法脱身。于是，一月底的一个早晨，王亚南以到湖南讲学为名，带了一个简便的手提包，只身离开厦门，搭上意大利邮船赴港。一个月后，他的家眷也悄悄地同样乘意大利邮船到香港。

这时，解放战争正在节节胜利地向前推进，全国解放在望。五月初，郭大力等许多进步人士都按计划撤退到香港

了。党包了一艘“湖南号”客轮，送他们北上到解放区。

“湖南号”在海上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航程，在天津码头靠岸了。王亚南和郭大力并肩靠着船舷站着，心情格外激动，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并且即将踏上解放了的土地。岸上是一片欢迎的人群。船一停妥，接待人员满怀热情地快步走上船来。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王亚南和郭大力。消息传开，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起来：“《资本论》的两位译者都到了呀！”

接着就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王亚南感到从所未有的激动，他觉得自己老式的黑框眼镜似乎蒙上了一层露水，视线有点模糊了。他轻轻地从心的深处吐出了一句：

“到家了！”

三 “老 农”

王亚南到了天津之后，很快就被接到北京。到达的第二天，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招待所来看望他，并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見。王亚南希望仍然到大学教书，他还是喜爱这老本行，况且在人民自己的大学讲坛上，可以畅所欲言地宣传马列主义，为人民乐育英才，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业！于是，他暂时被安排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门大学校长，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他离京南下，七月初，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厦门大学，厦大学生高唱着《厦大青年进行曲》热烈欢迎他。